

吴立昌 主编

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

——中国现代文学派别论争史论

复旦大学人文库

复旦大学出版社



吴立昌 主编

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

——中国现代文学派别论争史论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中国现代文学派别论争史论/
吴立昌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9
ISBN 7-309-04130-5

I. 文... II. 吴... III. 现代文学—文学史—史料
—中国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2402 号

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

吴立昌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杜荣根

装帧设计 陈 萍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920×1216 1/32
印	张	15.5 插页 2
字	数	388 千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500

书	号	ISBN 7-309-04130-5/I·271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自白

我是江苏镇江人。来到人间没几天，芦沟桥便响起全面抗战的炮声。二十年后，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所。七十年代末，回母校中文系任教，于一年前退休。教学之余，撰有《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中国现代主义寻踪》（与吴中杰合作主编）、《人间云雾》等著作多种。



目 录

绪论.....	1
---------	---

上 编

一 文学现代转型之先兆	
——晚清文学变革中白话文言之争	35
二 开启文学有无功利的重要话题	
——梁启超与王国维之争	52
三 怎样对待“纲常名教”	
——陈独秀与杜亚泉关于东西方文化之争	62
四 搬开文学革命的绊脚石	
——革新派与复古派之争	75
五 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	
——学衡派与新青年派之争	95
六 “老章又反叛了”	
——甲寅派与革新派之争.....	113
七 追求人生与游戏消遣	
——五四新文学观与鸳鸯蝴蝶派文学观之争.....	131
八 三十年代复古思潮的回流	
——针对“文言复兴”的大众语论争	143

中 编

- 九 非干文学的文学派别论争
——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争…………… 157
- 十 新文学阵营的进一步分化
——新月派与左翼作家之争…………… 167
- 十一 “死抱住文学不放”错在何处
——左翼与“自由人”“第三种人”之争 …… 181
- 十二 需要什么样的小品文
——左翼与论语派之争…………… 202
- 十三 并不清晰的文学派别论争
——京派与海派之争…………… 226
- 十四 陈年旧账难结清
——抗战时期左派与自由派之争…………… 248
- 十五 从《野玫瑰》之争看战国策派文学
——四十年代初另一起文学派别论争…………… 275
- 十六 胜券在握的政治批判
——四十年代末关于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之争…………… 291

下 编

- 十七 新文学向何处发展:写实还是浪漫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争…………… 311
- 十八 开极“左”文学批评之先河
——关于革命文学论争…………… 338
- 十九 对典型理论的解读和阐释
——周扬与胡风之争…………… 385
- 二十 口号与口号的撞击
——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 …… 401

二十一	民族形式问题的现代反思	
	——抗战前期民族形式问题论争·····	419
二十二	难以走通的纯洁文学意识之路	
	——延安文学论争·····	438
二十三	现实主义的存在空间	
	——关于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论争·····	456
二十四	萧军批判的历史指向	
	——建国前夕东北解放区的一场文学论争·····	473
	后记·····	489

绪 论

一

人自呱呱坠地,一个月,要办满月酒;一周岁,又有“抓周”之俗。此后每年都得过生日,每十年更要大庆,直至老死。然而,人的一生,因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种种主客观原因,其命运往往会发生一次两次甚至多次重大转折。这些转折却并不像十年一大庆那样的有规律;如果正逢十年整数,那也仅是偶合。

古今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庶几近之。不管是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发展格局中考察,还是打通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界限,或是其他种种说法,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总会有转折,总会呈现不同的阶段。如何看待,可以有不同标准。多少年来,只注意文学的外部联系,近二十年来,则多从文学内部规律着眼;当然,也可以从内外结合角度研究文学的发展及其分期。总之,只要不撇开文学本身,只要自认有理,就去实践,无须有固定统一标准。犹如人生命运的转折不能体现于十年一大庆,文学命运的转折也不能简单地以十年、百年来划分。

20世纪80年代中,首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说的学者,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作为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的起点。发生戊戌变法的1898年,开始了古代中国文学全面的深刻的“裂变”。其理论阐述充分而有说服力,且富于新意。所以很快赢得学界认同。其实,海外一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也有类似说

法。1898—1918 这二十年是中国文学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期,传统的分法是取其末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现在的分法则是取其开首,于是就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时间的分界看,这只能说是历史的巧合;文学发展的重大转折其实与“世纪”无必然联系。今天,正处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文学可有什么重大转折的迹象?“世纪末”、“新世纪”、“跨世纪”、“世纪之交”,乃至“论×十年代文学”、“×十年代出生作家”云云,除了与文学本身确有偶合之处外,当然也有如商家月末岁尾盘货结账以及为文论述方便的作用在,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这些提法和口号的宣传效应。

经济、政治、文化(包括文学)的现代化,本是针对中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中国文学与古代文学“断裂”,大踏步地向现代转型,严格说,应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始。十九世纪末,虽然“从文学观念到作家地位,从表现手法到体裁、语言,变革的要求和实际的挑战都同时出现了”,但只是开始出现,“一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才最终完成了这一‘断裂’”^①。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开始的传统说法,今天看来,并不违背历史实际,尽管具体阐释时已与过去有很大变化。下限至四十年代末,同样有充足理由,因为五四以来三十年间,中国文学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实在太休戚相关了,无论是从政者、从文者的主观认识,还是三十年文学发展的客观实践,都是如此,谁也无法否认。新中国的建立,这一政治上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文学的冲击和影响,更是前所未有,已全面而彻底地改变了文学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自身的面貌,而且已从局部(解放区)扩展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各个角落。一位学界有识之士,针对当代三十年

①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间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说得很到位:“面对如此现实,偏要简单、机械地强调不要以政治、意识形态来划分文学史,这多少有点牺牲事实来迁就于一种预先设定的理论了。”^①此话同样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划分,基于此,本书论述文学论争,仍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说法,将时限规定在五四前后至四十年代末这三十年间。

什么“界”都有派别。因为有思想,有信仰,有追求,于是便有歧异,不同派别也油然而生。即使同一学派内,也不会怎么清净,如弗洛伊德,对自己一手创建的精神分析学派,最为专断,但仍然接二连三有人“背叛”,另辟蹊径,所以,西方学界有人说,精神分析学派最大的特点是不断的分裂。文坛同样如此。鲁迅说:“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他还举了清代章实斋和袁子才之争,李莼客与赵执叔之争以及近代《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等实例;外国的,则讲了嚣俄(雨果)、霍普德曼的剧本公演时剧场里捉人打架的故事,以证明文坛的斗争的存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反对文坛斗争最力的沈从文,曾将其讥为“私骂”,很有些“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味道,但是现代文坛好几次颇有意义的论争,恰恰是由沈从文首先引发的。对具有挑战性言论和姿态的《新青年》很不以为然的《学衡》派,其实早就立下与之论辩的宏愿了;他们论辩的唯一理论武器就是欧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而白璧德自二十世纪初提倡新人文主义以来,也一直毁誉并至,论争不断,甚至蔓延到大众文化领域(三十年代纽约一次公众讨论会,参加者竟达三千多人)。鲁迅以为,文坛尽管有些

① 曹文轩:《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笔谈·对一个概念的无声挽留》,《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混乱,但“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别”,经过斗争,是非“越加清楚,越加分明”,所以,“文坛是无须悲观的。”^①

中国现代文坛三十年间,论争此起彼伏,数不胜数。许多只是两人之间围绕某个文学的枝节性具体问题争个不休,意义也许不大,文学论争史可以略而不记;但也有许多论争,不只是个人之间的事,也不是枝节问题,而是双方各自代表一些人的观点,且多为文学的重要原则问题。这样的论争,一般出现于不同文学流派之间。凡形成文学流派,总有其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文学观念、审美取向、创作风格等等。凡文学流派或社团,总有各自的言论阵地(杂志、副刊、出版社等),有随时发表自己的主张和作品的自由,也有随时批评别人的主张和创作的自由。这样,在流派、社团之间乃至整个文坛,大大小小的摩擦、碰撞、论战,便时有发生。在论争中,往往因掺杂个人意气、小团体情绪和宗派立场而使原来的文学流派之争变了味。所以,用“中国现代文学派别论争”来概括本书所述内容,似更妥帖。

二

不是在占有、梳理、辨析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去评论历史现象,总结历史规律,而只是以某种理论做教条,搭起一个主观预设的框架,然后搜罗一些史料分门别类往里填实,这种所谓行之多年皆有效的“以论带史”法,当然是研究之大忌,现已愈来愈少人问津。然而,摒弃“以论带史”,决非摒弃理论本身。不管研究什么学问,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回避不了。研究现代文学派别论争,面对大量史料,怎么剔抉,怎么整合,怎么判断——传统还是新潮,一元

^① 《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

还是多元,总得有个基点,有个标准,这就是老生常谈的观点和方法。

当今文坛,追赶西方新潮的步伐日益加快,新观点新方法新概念新名词,真是层出不穷,眼花缭乱。常常一个原本并不复杂的道理,似乎只有用叠床架屋的新名词包装,才能显示其思想之“新”,学问之“深”。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不仅在追逐新潮者眼中大大跌落,而且怯谈羞谈马克思主义已成普遍现象,有时甚至自己立论的根据明明来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愿在文章中出现这几个字,好像只有这样才与“左”、“教条”、“僵化”之类脱尽干系。有趣的是,新潮学者言必称的几位当代西方最杰出的思想家,自前苏联、东欧剧变以来,却纷纷“走近马克思”。美国著名后现代理论家詹明信(又译詹姆逊)最近说:“我们要强调的是,人们当然可以脱离历史而谈后结构主义文本本身的价值,但如果你想在更大的语境中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就得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框架。”^①公认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则说出“没有马克思就没有将来”、“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遗产的继承者”这样的话^②。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又转身走近马克思,并公开申言:“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又一次处在正确无误的揭示我们这种类型的社会发展趋势的位置上”^③。虽然他们是从各自的出发点,以各自的理论和方法走近马克思,但最终的“走近”,却表明马克思主义至今仍继续散发其特有的思想魅力和理论光辉。

对本书论述的中国现代文学派别论争这一历史现象的反思和

① 张旭东:《“理论”仍在途中——后现代理论家詹明信访谈录》,《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7月26日。

② 转引自陈学明:《重读马克思:哲学大师的“转身”》,《光明日报》2002年4月18日。

③ 同上。

重评,我们还是应该努力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因为它对辨析和厘清历史纠葛真相的指导作用并未减弱,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论述,马克思说:“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他变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①,“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将被黑格尔倒置的“世界”拨正过来^②。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行之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③,然后才能谈及其他。恩格斯后来将其概括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④。

当然,研究历史的视角和方法也是多元的,只要它是科学的,都应该学习和借鉴。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学热”兴盛以来,史学大师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极受学界推崇。陈氏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⑤中谈到撰写中国哲学史时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了解”,是指对古人著书立说时所处之环境和背景的了解。但因今日依据之材料,实为当时遗存最小之一部,所以陈氏提出,“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方能以今日掌握之最小材料窥测当时之全部,“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一般理解,“艺术欣赏”要求欣赏者应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并对艺术品注入强烈的感情,与艺术品作者同脉搏共呼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32页。

④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08页。

⑤ 刊于《学衡》74期(1931年3月)。

吸,以达到两者融为一体的至高境界,才能把捉艺术之真谛。但从陈寅恪总体论述看,并非仅仅强调一般艺术欣赏过程中的想象和感情,他说:“所谓真了解,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处于同一境界”,就是研究者应该为古人设身处地的去想,去言,去行,而不是离开古人当时之情境。“艺术欣赏”、“同情”,盖指此也。我们应该领悟陈寅恪这里所强调的,决非感情因素,而是强调对历史的客观体认和评价。否则,他为何紧接着又提醒人们,“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研究者倘若“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其言论愈有条理,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一句话,无视当时的历史情境,只知从今天的现实情境出发,用今天的标准去观察古人,整合史料,其结果只能如此。

为古人设身处地着想,对于历史上的论争来说,又出现问题了。既是论争,就有双方乃至多方,你为哪一方着想?向哪一方表同情?问题还得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不是某一方所处之“境界”,而是各方所处之大环境、共同境界,亦即当时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社会的整体状况。只有将论争各方的言行置于当时的大环境下考察,才可以对论争的是非功过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我们以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派别论争的反思和重估,也不可须臾离开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原则立场。

论争双方或多方,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但存在不一定是合理的。每一场论争的发生,各方提出的主张和观点,都有其动机和理由,都有其针对性,都离不开当时的具体情境。论争每一方的观点是否合理,主要看他总体上是否合当时之理,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革新、时代潮流的发展,起着怎样的作用。

请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之争为例,略述我们对此问题

的态度。在这场论争中,封建顽固派所起的明显的反动作用,至今很少有人提出异议,但对于保守派(或文化保守主义)的杜亚泉及稍后的学衡派等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却需重新认识和评估。因为以往的文学史对他们要么干脆不提,要么片面地突出他们思想理论中某一点,然后武断地予以全面否定,今天当然应该尽可能还其本来面貌,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过,重评同样不能离开当时情境。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派,是针对现实提出反孔的,当时的反对者在通信中也已看出陈独秀“俱针对现社会现国家立说,与纯然说理者不同”,陈在回答时也明言,“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处,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①陈独秀认为,正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学说严重阻碍了当时社会变革的进程,所以要反。杜亚泉、学衡派欲保守的是否就是此玩意?不是,那是什么?是的,对社会变革历史发展又起怎样的作用?革新派有过激言论,保守派当时只是为了“纠偏”,还是根本否定革新派的反孔和文学革命主张?一系列问题均需要在今天重评时予以准确的解答。

随着国学热兴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便成“时尚”,风头最健者当推新儒家,其重要表现之一便是质疑甚至否定新文化运动,辜鸿铭曾对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的目的做过如下分析:“文襄之效西法,非慕他也;文襄之图国强,志不在富强也。盖以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可以保名教。”^②五四时期猛攻“名教”者,有自由主义(五四初期新青年派应归为自由主义范畴)及稍后之马克思主义;保“名教”者,除了顽固复古派,还有一些新旧、中西文化调和论者,根本上还是要保住儒家命根子的“名教”,自1920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以后就发展新儒家,此前只能算是

① 《通信·俞颂华、陈独秀》,《新青年》3卷1号(1917年3月)。

②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

序幕。此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鼎足而立,围绕着中国怎样走现代化道路的问题,论争不断,构成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一幅斑斓图景。新儒家认为民族危机实质为文化危机,在文化上,它不一味复古,而是主张接受西方文化,不过应摒弃由西方物质文明造成的病态因素,以中国儒家文明予以弥补,且以后者为主为“体”融会西方文化。李泽厚较为准确地概括新儒家的基本特征为:“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罗素、康德、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①这股思潮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从大陆销声匿迹近四十年后,又由海外一些华裔学者传播进来,不少大陆学者便纷纷效尤,反思、质疑“五四”几成显学。他们基本上沿袭海外学者的思路,从学理上冷静反思“五四”在反传统过程中的激进态度和绝对化偏向,警示人们应正视“五四”还有另外一面,这对全面科学的总结“五四”经验教训,无疑是一大贡献。但是,他们的结论则是由此而指认“五四”是“全盘性反传统”,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能,甚至将“五四”当成建国之后直至“文革”愈演愈烈的极“左”批判运动的思想发源地。在此气氛中,近几年便出现了重评乃至全盘肯定杜亚泉和学衡派、对“五四”激进主义从反思转向文化保守主义从而与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求实态度重评“五四”决然相反的文化景观。

上述文化景观的出现,乃是一些研究者忘却至少是忽视了二十世纪起始一二十年间中国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只一味追寻所谓“学理”研究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似乎一联系环境和背

① 李泽厚:《略论现代新儒家》,《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266页。

景,就不是“学理”,不成其“学问”了。其实,对一个问题或一个现象的研究,同样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仅作纯学理的阐释。今天的“五四”质疑派,无视这样一个事实:陈独秀当年不是在撰写全面论述孔子思想的学术论著或编写儒家研究的教科书。他的政治意图和斗争策略很清楚,就是一切为了启蒙,为了救亡。他认准儒家纲常名教的伦理政治和阶级制度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伦理的觉悟才是中国人最后的觉悟,因此他首举反孔大旗。陈独秀很清楚,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虽为主流、正统,但并不能替代其他各家,陈独秀也反复表示,“儒术孔家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决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学说也”^①;“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②;“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③,等等。可见陈独秀所反对者,不是孔学的全部,更非传统文化的“全盘”。当下海内外“五四”质疑派一致指责陈独秀“全盘性反传统”,符合历史实际吗?

陈独秀以及他的同道和战友在反孔过程中,确实有不少过激言论,其中既有斗争策略,也有观点和方法的片面性绝对化。对于这个问题,当年《新青年》一些敏锐的作者早有所觉察。杜亚泉及稍后之学衡派更是着力批评了新青年派这个缺点,今天重评,充分肯定他们在论争中的纠偏醒世之功,正是为了全面的理解历史总结历史。然而,陈独秀与杜亚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更重要的分歧和论争焦点,却在对儒家“纲常名教”的态度。前者极力反对,后者坚决固守。杜亚泉认为,本来,“名教纲常诸大端,则吾人所以为是者,国人亦皆以为是”,但因《新青年》引进西洋文明,而使此

① 《通信·复吴虞》,《新青年》3卷1号(1917年3月)。

② 《通信·复常乃德》,《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

③ 《通信·复佩剑青年》,《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